

王闿运与桐城派

——论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另一渊源

傅宇斌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 云南昆明, 650092)

摘要: 桐城派对湖湘派领袖王闿运文学思想的影响是隐势的。不管是在学理、地域、教育以及王闿运的交游上, 都可以发现桐城派和王闿运之间的渊源关系。王闿运的很多重要思想都可以说是对桐城派的袭用和吸收。

关键词: 王闿运; 桐城派; 学理; 地域; 教育; 交游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4-0542-06

王闿运文学风格取法于魏晋, 历来学者都有论定。如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便将王闿运列为魏晋文的代表人物,^[1]此后学术界多沿袭这种观点。实际上, 作家作品的风格以及作家的思想必然受其同时代风气的影响。同时, 他的交游和他的教育背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观点。通过梳理《湘绮楼日记》和比照王闿运文学观与桐城派的文论, 我们发现, 桐城派也是王闿运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可缺一, 该理论创之于姚鼐。姚氏在《述庵文钞序》中说:

余尝论学问之事, 有三端焉, 曰: 义理也, 考证也, 文章也。是三者, 苟善用之, 则皆足以相济; 苟不善用之, 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 固文之贵也, 寡闻而浅识者, 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 其辞芜杂相近, 如语录而不文; 为考证之过者, 至繁碎缴绕, 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 而反以为病者, 何哉? 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 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 虽美不能无偏, 故以能兼长者为贵。^{[2](499)}

桐城派为有清一代最大文派, 它对清代文学的影响可谓贯彻清代文学发展的始终。桐城派早期重义理而不废文法, 盛期入考据而实重词章, 后期加以经济之学而能与时俱进, 它的文学理论始终能够兼收并蓄, 恢张包容, 且于细处颇能着眼, 精微之论比比皆是, 实集古代文论之大成。所以清代各种文学理论要避开桐城派影响实不可能, 阳湖派如此, 骈文家如此, 性灵派甚至汉学家也如此。湖湘学派僻处楚地, 意图独树一帜, 但言论多落入桐城窠臼, 实因受时与地的限制。王闿运为湖湘派盟主, 虽思自立, 且敢发大言, 但仍然有意无意地接纳甚至袭用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兹论述如下。

(一) 王闿运“经学、辞章、人品”与桐城派“义理、考据、文章”的相融

桐城派理论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 三者不

姚鼐其实是主张义理、考据都要融入文章中, 他提出以“考证”入文章, 原本含有调和汉宋的意味, 姚氏本有汉学家传^①, 对汉学之优长深有所知, 故而他论文汉宋并举。然而这一理论同样符合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前世正统文章家多主张“文”“道”并举, 而且对这一理论的实践已毕尽能事, 清人想超越前人, 只有另辟他途。汉学家的考据手段无疑为文章家超迈前人提供了有效工具。因为字句要精准, 音律要圆妥, 修辞要巧妙, 自非得用细碎的考据工夫来展现了。这种融通的理论自然无往而不胜。

王闿运则提出“经学、词章、人品”的合一。其论曰:

今世所云经学、词章, 即史家儒林、文苑, 皆世人之一艺, 入世之羔雁, 曾非学也。圣人词无不章, 学则垂经, 虽自天生, 亦由人力。用以应世, 沛乎矣乎! 后世学废, 士思自见, 笃诚者则传章句, 颖慧者

收稿日期: 2007-12-29; 修回日期: 2008-03-12

作者简介: 傅宇斌(1976-), 男, 江西丰城人,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清代及近现代文学与学术。

则炫文华，聊寄聪明，无关德性。然或因文见道，养性怡情，就其所成，亦能变化。通经者未有不文，能文者未有无学。文学之士未有无德。（《王志·论经学词章人品之异》）^{[3](512)}

这种论调显然是桐城派理论的沿袭。王闿运虽然认为经学、词章、人品各有侧重，但还是承认三者合一最为理想，他所谓“经学”“词章”“人品”实为“考证”“文章”“义理”的对应，考证作为经学的功夫，湖湘学人也是谨守不弃，如魏源、何绍基等等。王闿运在《王志·论五言作法》中就坦言诗也可入考据：

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此语发自梁简文、刘彦和。又云不可入议论，则明七子惩韩、苏、黄、陆之蔽而有此说，是歧经史文词而裂之也。……余幼时守格律甚严，矩步绳趋，尺寸不敢失。及后贯徹，乃能屈刀为镜，点铁成金。如此篇“皋”、“潮”二韵，是考据也。……廿字中考证辩驳，从容有余。若不自注，谁知其迹？镕经铸史，此之谓与？^{[3](541)}

王氏批驳桐城甚力，而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却也剿袭坦然。于考据入诗且沾沾自喜，与桐城派、宋诗派实无二异。他之所以不沿用桐城派的说法，一为自立之心理，一为对宋学之反动，对于文章之实质并没有多大区别。^②

（二）王闿运的“摹仿论”对桐城派理论的吸收

王闿运文学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复古，复古便是摹仿，在《论文法·答张正暘问》中论述甚详：

文有时代而无家数。今所以不及古者，习俗使之然也。韩退之遂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如是仅得为拟古之文，及其应世，事迹人地全非古有，则失其故步，而反不如时手驾轻就熟也。明人号为复古，全无古色，即退之文亦岂有一句似子长、扬雄耶？故知学古当渐渍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事所无者改而文之。^{[3](538)}

王闿运认为学古文当讲求“渐渍”和“临摹”，他批评韩愈“仅得拟古之文”，批评明人复古“毫无古色”，乃是因为王氏执行更严格的摹拟标准，他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摹仿，而是要求“渐渍于古”，这实质是要求有古人之心，古人之意，故而他反对仅学某门某派的，而是能够融入那个时代去，也正如陈子展所说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六朝人”。这种理论并非是机械的、不可变通的，他也讲“脱化”，讲“有时代”，可以说，王闿运追求的是水到渠成、自然高妙的古逸风格。然而，王闿运的摹拟论只不过是桐城派的踵事增华而已。姚

鼐已经讲摹仿和脱化，他在《与管异之》中说：

今之诗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资逊之，亦是涂辙误而用功不深也。若涂辙既正，用功深久，于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谅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近世人习闻钱受之偏论，轻讥明人之摹仿。文不经摹仿，亦安能脱化！观古人之学前古，摹仿而浑妙者固可法，摹仿而钝滞者自可弃。虽扬子云亦当以此义裁之，岂但明贤哉。^[4]

至方东树，则认为学古文之法在于“精诵”，实开王氏摹拟论之先声，其论曰：

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藏，不则心与古不相同，则往往高下短长齟齬而不合。……今为文者多而精诵者少，以轻心掉之，以外铄速化期之，无惑乎其不逮古人也。（《书惜抱先生墓志后》）^[5]

方东树之“精诵”正有类于王氏之“渐渍”，“心与古同”也有似于“古色”，即也要求学古当有古人之心，与王闿运的理论正可相通。然而直接影响王闿运者或当为曾国藩，其论学古文之严恰如王氏所论，其论曰：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与张廉卿》）^[6]

曾国藩所论是对刘大櫟“神气”说的发挥，他要求学古文时，当一字一句琢磨，不仅要得古人之形，而且要得古人之意，这可以说是王闿运摹拟论之嚆矢。

（三）王闿运文体论“思兼单复”与桐城派“骈散合一”

论文体时，王闿运受桐城派的影响也很深。王闿运文体论的最大特色便是讲究“单”“复”二法，其曰：

此外文家则单复二法，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谓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诸家之文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决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王志·论文》）^{[3](550)}

王闾运所谓“单”，即指散文，“复”，即指骈体文，王所以讳言“骈”“散”，一则此二词为唐人所发明，与其宗汉魏六朝之旨有异，二则认为文章本无骈、散对立，故无须造出二词来。所以王闾运的意思是要骈散合一，而桐城诸家对这种观点早有论述或表现出这种倾向。姚鼐纂《古文辞类纂》，列辞赋一类，已隐有骈散合一的趋势^[7]，至姚氏弟子，鼓吹骈散相合者，刘开为最。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刘氏言道：

夫词岂有别于古今，体亦无分于疏整。……骈之于散，并派而急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所产。故骈中无散，则气雍而难流；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而不能偏废。^[8]

刘氏说得斩钉截铁，实是深明文体之法。文章纯骈，固显工丽整饬，却少流动轻盈之气；文章纯散，虽见气势，却乏音乐之美，增冗长之感。骈散合一，则错落有致，奇偶相生，流动的气韵和音节的和美相得益彰。梅曾亮则早期工骈文，后期始重散文，亦不废骈文，与他们同时者有桐城派之旁枝阳湖派，也提倡“骈散合一”，而以李兆洛鼓吹最力：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杂，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俪。而为其学者，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沿其流极而激之，以至乎其源，则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于阴阳也。毗阳则躁剽，毗阴则沉隄，理所必致也，于相杂迭用之旨，均无当也。^{[2](464)}

李兆洛的言论，直突出桐城藩篱之外，可谓石破天惊！他也有否定“骈”“散”此固定语的意思，而用“奇”“偶”代替，王闾运的“单”“复”说正与李氏文论如合符节，只不过稍以增词而已。然而王闾运的理论直接源于曾国藩亦未可知，曾国藩也提倡“骈散合一”，他在家书中曾晓谕曾纪泽十一种必读书目，其中即有文选，由此可见曾氏治文祈向，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说：

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独不然？六籍尚已。自汉以为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班氏者

也。茅坤所称八家，皆师韩氏者也。传相祖述，源远流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类，于是刺议互异，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来骈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将厌，宋代诸子乃承其蔽而倡为韩氏之文，而苏氏遂称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真其才之足以相胜，物穷则变，理固然也。^③

曾氏所论实更具宏通之眼光，他认为骈散之分实起于明。显然，要是文学史没有高屋建瓴之气魄，是不可能作出这种合理判断的。王闾运因其性格使然，不可能照搬曾氏言论，因而取消骈散之说，而别出心机。实则道理相同，可见王氏实在是吸收和偷换了桐城派的观念。

二

以上是从学理上探讨王闾运文学思想渊源于桐城派的可能性。下面再从桐城文派的地理流传情况和王闾运早期所受教育及其个人交游方面讨论这种可能性。

(一) 桐城派流传湖南的情况

桐城派于乾嘉时期即大行天下，湖南虽向崇《庄》《骚》、六朝，然亦多取法桐城，广习时文，为桐城派弟子者不少。兹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将所涉湖南作家列表1。

从表1可知，湖南名士出自桐城门下者66人，长沙、善化^④一带即有20人，且大都为嘉道以后人^[9]。王闾运虽为湘潭人，却一直生长于善化，后入城南书院读书^[10]，长沙、善化的桐城文风影响王闾运当属必然。

(二) 科举制度下桐城文风的盛行

从王闾运所接受的教育看，也不能免受桐城派的影响。清代教育以科举考试为中心，而当时各级考试又无不以八股文为大宗。从院试到乡试再到会试、殿试，俱以八股文的写作好坏为准绳^[11]。八股文又称为“时文”“四书文”“制艺”，对八股文作品进行选评的人被称为“选家”“选文家”，当时的儒林硕望，文坛隽秀无不工于时文，而且多以选文为务^[11]。名家的选评八股文得到广泛流传，乾隆时最著名的八股文选家即为桐城派的方苞，他奉乾隆之命选定的八股文名为“钦定四书文”，所依据的选文标准概以清真雅正为宗，并加圈点，而成为士林准式。后来姚鼐主钟山书院时，又编钟山书院课艺，风靡一时。桐城派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点便是“以时文为古文”，其所选文及评点都不脱

表1 湖南作家渊源考

宗派	作家	籍贯	仕履	师承	备注
归有光	吴绩	长沙	乾隆进士		
	任哲	巴陵			
	吴敏树	巴陵	道光举人		与曾国藩、郭嵩焘等交密
	吴庭树	巴陵			吴敏树弟
	方大淳	巴陵	道光进士		与吴敏树文字交
	龚黼休	巴陵	道光拔贡	吴敏树	
	吴镜蓉	巴陵			吴敏树子
	杜贵墀	巴陵	光绪举人	吴敏树	
	方大堪	巴陵		杜贵墀	
	曹佐熙	益阳		杜贵墀	
	李孟麒	长沙		王先谦	
	段伯猷	长沙		王先谦	
	周声洋	长沙		王先谦	
	周声溢	长沙		王先谦	
	钱昌澜	长沙		王先谦	
叶德辉	长沙	光绪举人		与王先谦师友之谊	
方苞	黄贤宝	长沙	乾隆举人		
	吴大廷	沅陵	咸丰举人		
	刘蓉	湘乡		吴大廷	与曾国藩、郭嵩焘交密
	黄逢泽	长沙			友曾国藩、郭嵩焘、吴敏树
刘大櫟	谢振定	湘乡	乾隆进士	程晋芳	
姚鼐	曾国藩	湘乡	道光进士		
	曾纪泽	湘乡	同治进士		曾国藩子
	向师棣	溆浦		曾国藩	
	翁廉	湘潭		刘庠(师曾国藩)	
梅曾亮	舒焘	溆浦			
	欧阳勋	湘潭			曾国藩为其遗集序
	杨彝珍	武陵		梅曾亮	
	孙鼎臣	善化	道光进士	梅曾亮	城南书院山长
	周寿昌	长沙	道光进士	梅曾亮	与何绍基、曾国藩交密
	覃远璘	石门	咸丰进士	梅曾亮	
	何庆涵	道州	咸丰举人	杨彝珍	
	阎镇珩	石门		杨彝珍	
	杨球光	武陵			杨彝珍子
	杨琪光	武陵			杨彝珍子
	李振钧	湘潭		杨彝珍	
	宋炽昌	湘阴		杨彝珍	
	瞿鸿玟	善化	咸丰进士	周寿昌	
	周澹蕃	长沙			周寿昌子

续表

宗派	作家	籍贯	仕履	师承	备注
	何应琪	善化		朱琦	
吴汝纶	王景逵	衡水		吴汝纶	
	周黼麟	长沙	嘉庆举人		
	周树槐	长沙	嘉庆进士		
	周湘黼	长沙	道光举人		
	邓显(昌鸟)	新化			邓显鹤兄
	邓显鹤	新化	道光举人		
	徐凤藻	善化	道光进士	邓显鹤	
	胡倬	武陵	道光进士	邓显鹤	
	邓瑶	新化	道光举人		邓显(昌鸟)子
	邓琮	新化			邓显(昌鸟)子
	邓琮	新化	道光拔贡		邓显鹤子
	邓琳	新化			邓显鹤子
	郭嵩焘	湘阴	道光进士		与曾国藩、吴敏树等交密
私淑桐城者	李元度	平江人	道光举人		入曾国藩幕
	郭刚基	湘阴			郭嵩焘子
	郭庆藩	湘阴			郭嵩焘侄
	罗正钧	湘阴		郭嵩焘	
	陈翰	湘阴		郭嵩焘	
	王先谦	长沙	光绪进士		岳麓书院山长
	王先恭	长沙			王先谦兄
	王先慎	长沙			王先谦弟
	王龙文	湘乡		王先谦	
	刘照隅	湘潭		王先谦	
	陈毅	湘乡		王先谦	
	颜昌峣	湘乡		王先谦	
	苏舆	平江		王先谦	

古文之法，故而桐城派亦随八股文之风行而更盛^④。王闿运一生都追逐功名，不废科举，他10岁即学时文，此后从其叔父习作文之法，18岁入城南书院，师从陈本钦、熊少牧，后参加乡试及会试，两次会试不中后，转向于治经讲学，而他讲学各书院时，率以课艺为务，浸淫于时文不可谓不深，而王闿运所制时文，也号为晚清名手^{[11][243]}。因此，王闿运受桐城影响可想而知。再以城南书院学风而言，桐城派之影响也渊源甚长。城南书院于清嘉庆时重建，而主其事者为当时的岳麓书院山长罗典，罗典为制艺名家，罗后掌城南书院者先后为贺熙龄、陈本钦、孙鼎臣、何绍基^⑤，贺为经世派代表，孙为桐城派健将，何为湘乡派干城，亦主桐城家法，陈本钦则工制艺，在清季书院培养人材的方式即以考课制艺为重^[12]。冯桂芬评论岳麓、城南两书

院时说，“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不及经史；所治不过文艺，不及道德！”^[13]在这种教育背景下，王闿运在城南书院3年，不能说不晓桐城文法。

(三) 王闿运与咸同之际桐城派名家的交游

再以王闿运交游论，也说明了王闿运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王闿运15岁即立志“一意于取友”，在其日记中虽无明言受益于何人，但通过年谱和日记，蛛丝马迹仍可找寻。王闿运入城南书院前一年结识郭嵩焘，此后其友朋关系维系终生。郭虽对王的为人有微词，但认为与其谈文却是一大快事^[14]，可见他们的文学交游实为不浅，互相的影响也是当然。曾国藩创办湘军后，王闿运曾入曾的幕府，与曾多次深谈，虽或有军机可商，但谈文亦属正常。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王

闿运又拜会多次,并投递所撰诗文与学术著作与曾^①,可见曾国藩对王闿运也有相当影响,而王闿运撰《湘军志》时,翻阅曾国藩的文集及日记殆遍,极为推服。王闿运受曾国藩的影响则无疑义,其暗中接受并吸收桐城文法于中可见。除郭、曾二人对王影响甚大外,王闿运还与多位桐城名家有深交或夙识,这些人是周寿昌、潘祖寅、张金铺、瞿鸿禛、何绍基、李元度、王先谦、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②。

三

历来学者多认为王闿运的文学思想保守,不能与世推移。这种特点也被认为是湖湘派的家风,如汪辟疆先生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就认为“向来湖湘诗人,既以善叙欢情,精晓音律见长,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有一唱三叹之音,有竟体芳馨之致”。^[15]有见于此,历来讨论王闿运的学术和文学思想时,多侧重于王闿运与湖湘学派的关系。然而,从我们上面的论述可知,桐城派的文学观点是王闿运文学思想的重要源流。盖此二派对王氏影响一为显势,一为隐势。显势容易彰明,隐势却隐藏甚秘。实质上隐势的影响同样重要,桐城派对王闿运的影响即如此。

注释:

- ① 姚鼐的祖父姚范即为著名的经学家,有多种经学著作传世。
 ② 对于王闿运的心理和性格可参见拙文《湘绮楼日记与王闿运的性格和人格》,《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1期。
 ③ 参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第401页。
 ④ 尤信雄在其书中探讨了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的观点,见《桐

城文派学述》第五章《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关系》。

- ⑤ 参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善化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1年编选,第153页。再据本志《人物·孙鼎臣传》知孙在陈任山长时即任教席。
 ⑥ 王闿运此次拜访曾国藩系同治十年(1871),王闿运和曾国藩的日记中均有记载。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岳麓书社1997年版,卷一。《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同治十年”条。
 ⑦ 《湘绮楼日记》中均提及。

参考文献:

- [1]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1.
 [2] 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 王闿运. 湘绮楼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7.
 [4] 姚鼐. 惜抱轩全集·书札[M]. 上海: 国学整理社, 1936.
 [5] 徐中玉.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373.
 [6] 曾光炎. 曾国藩嘉言录[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 47.
 [7] 尤信雄. 桐城文派学述[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75.
 [8] 刘开. 刘孟涂集·骈体文(卷二)[M]. 清道光六年桐城姚氏槩山草堂刊本.
 [9] 刘声木. 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0.
 [10] 王代功. 湘绮府君年谱(卷一)[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11] 商衍鏊.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8.
 [12] 王德昭.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99-115.
 [13]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北京: 上海书店, 2002.
 [14] 郭嵩焘. 郭嵩焘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146.
 [15] 汪辟疆. 汪辟疆说近代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1.

On relation of Wang Kaiyun and Tongcheng School

FU Yu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 China)

Abstract: What Tongcheng School had affected Wang Kaiyun's literary thoughts was a hidden potential imp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ang's literary theory, regional influenc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friends-making, the author finds the original relation between Tongcheng School and Wang Kaiyun. Many important thoughts of Wang's stemmed from Tongcheng School.

Key Words: Wang Kaiyun; Tongcheng School; literary theory; regional influence; education background; friends-making

[编辑: 苏慧]